

持續與改變：評估中共的對外政策

張京育

本文乃本中心副主任張京育博士為第八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本年五月十七至廿日在美國南卡羅萊拉大學舉行）所撰寫之論文。原稿為英文，經本中心副研究員畢英賢先生中譯。茲經商承同意，特予刊出，藉供讀者參考。

編者。

壹

過去三十年中，中共對外政策的基礎乃是國家利益與世界革命，後者以馬列毛主義為依據。統一戰線是北平對外政策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

國家利益與民族主義是兩個單獨的概念，但在策訂對外政策時，兩者却密切相關。國家利益首推安全、領土完整、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以及經濟發展^①。民族主義是一種最強烈的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影響着國際關係。與民族主義相關聯的願望有：創造主權國家，民族統一，獨立與自治，向外擴張以求民族光榮。如果一個國家已遭受失敗與屈辱，如果一個國家仍感不安全與不滿其權力與地位，那麼民族主義勢將成爲其對外政策的更加強烈的動力基礎。

過去三十年中，中共對外政策的紀錄清楚地顯示出其對國家利益與民族主義的關切。它堅持一個中國與國家統一的想法。它曾迅速控制邊境地區。它曾攻擊外島，強力奪取一些南海中有爭議的島嶼。它曾在韓國與美國作戰，與印度發生邊界衝突，與蘇聯長期鬭爭，最近則入侵越南。

中國在遭受一個世紀的國際挫折之前，原曾在東亞長期扮演主要角色；可以預期，中共將迫使國際承認其主要大國的地位。它不僅決心保衛領土完整，而且決心把敵對勢力驅離邊界地區，還在東亞及東南亞獲取優越地位。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它反對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最近，這種反對已消聲斂跡，因爲中共認爲蘇聯對其安全與影響力更具威脅。北平頭目們業已要求，「在解決任何國際重大問題時」，應顧及中共的意見。他們不斷聲明，若無中共的參與，「任何國際問題，尤其是亞洲問題，皆

註① F. S. Northedge. (ed.),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Powers* (強國的對交政策)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17-22。

不可能解決」^②。此外，北平的項目們始終主張，他們的革命戰略與他們的發展模式是其他低度開發國家的人民所應遵循的模式^③。

作爲一個革命大國，中共的對外政策也受其革命意識形態的導引。作爲一個革命者或馬列主義者，在毛澤東的背景中，沒有什麼因素使他贊成現有的國際體系長期存在。中共黨徒激烈推行馬列主義，加速不可避免的世界共產革命。毛於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會說：

「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必然取得勝利。」^④

要了解中共的對外政策，必須先了解馬列主義革命的概念。這些概念包括世界性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勢力之間的敵對性，在反資本主義國家鬥爭中「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重要性，共產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

中共是一個革命政權，相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衝突不可避免，並相信共產主義最後必然勝利，他們不會把當前的世界秩序視爲合法的與永恆的面予以接受。他們認爲，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正義鬥爭」是「他們的國際義務」。作爲馬列主義者，中共黨徒視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爲「帝國主義者」的後方，消除其後方支援，可削弱「帝國主義者」本身。

對任何獨立國家皆可發動「民族解放」戰爭，如果該國政府是「帝國主義」大國的傀儡，或是在新殖民主義控制之下。下列國家皆曾一度被包括在這類國家內：泰國、緬甸、寮國、印度、印尼、菲律賓、剛果、南越等。北平曾經贊揚這些國家的人民所堅持的武裝革命鬥爭道路^⑤。

中共對於世界革命採取了雙重態度。它一方面強調援助革命勢力的國際義務，另一方面強調在進行革命中的自立。中共是一個支持世界革命的國家，爲了維持這種信譽，它曾作出三種「貢獻」：

(一) 作爲一個模式：中共的新殖民主義概念爲革命者提供了一個民族主義問題，甚至當一個民族獲得獨立後，仍可藉着這

註② 第一項聲明係一九五六年由周恩來所發表；第二項於一九五四年由「新華社」發表。兩者皆轉引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共黨中國與亞洲) (New York: Vintage, 1961), 65.

註③ 中共政權成立後不久，中共第二號頭目劉少奇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宣稱，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人民應當追隨「中國人民擊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選取的道路。他特別指明，這個道路係由毛澤東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與黨的建設——所組成。(劉少奇在「亞澳國家工會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載於 *For a Lasting Peace, For a People's Democracy*, December 30, 1949, 14.)

註④ Cited in Barnett, *op. cit.*, 68. (譯註：「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註⑤ Edward E. Rice, *Mao's Way* (毛澤東的道路)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352; 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革命與中國對外政策)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55.

個問題糾合人民的支持。毛澤東的一次打擊一個主要敵人的統一戰線戰略，以及呼籲農村工農聯盟奪取城市中心的游擊戰略，似乎適合很多以農業爲主的國家的革命潛力。北平已向「極不滿現況並尋求改革之道的異化與有反叛性的青年知識分子」提供了「實用的意識形態」與進行革命推翻既有權威的理論^⑥。

(一)作爲半官方關係或承認的根源：中共透過半官方或共產黨來處理其與革命組織的關係，對待革命領袖有如對待既有政治實體的領袖。尤有進者，很多革命組織——諸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泰國愛國陣線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皆曾一度在中共地區設有連絡機構。

(二)作爲物資援助的源泉：此種援助包含政治與軍事訓練、宣傳支援及武器供補。除非中共認爲事關國家安全利益，通常不動用其軍事人員。

我們可對國家利益與世界革命在中共對外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稍作進一步的探討。毛澤東首次所作的對外政策決定乃是一九四九年所採用的「一面倒政策」。這一舉措對中共利益大有裨助。當時的美國被視爲中共安全的主要外來威脅，也是其雄心壯志的主要障礙，故依賴最強大的共產國家以求取政治與軍事支援，使新政權能够着手政治整頓、社會化與工業化，乃合理的選擇。在經濟方面，蘇聯也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提供中共發展計劃的資本與技術的國外來源。就安全、政治支持、與經濟發展觀點看，一九五〇年在莫斯科所簽訂的友好、聯盟與互助條約對中共是有利的。這種一面倒政策使中共能够對「帝國主義者」發動無情的文字戰與有限的行動。不用說，當時兩個共產政權對世界革命的觀點非常相近。

然而中共決心與蘇聯維持密切關係，在本質上乃基於利益的打算。中共需要蘇聯的支援以完成其國家目標，其中以安全、統一、經濟發展與大國地位最爲重要。只要蘇聯繼續爲其安全提供核子庇護，給予經濟與軍事援助使其成爲一個強國，並在決定共產集團政策時平等相待，則中共將與蘇聯繼續合作。當蘇聯不支持中共的主動行動（諸如第二次外島危機，以及與印度的衝突），或拒絕給予能使中共成爲主要工業與軍事強國的（經濟的與核子的）援助時，那麼中共與蘇聯合作的價值已不復存在。也許更基本的是，中共業已了解，蘇聯不願見到中共成爲另一個共產巨人，而想要中共永久接受在共產集團中的第二把交椅。同時，關於戰爭不可避免、支援「民族解放運動」、和平共存構想以及其他關於世界革命最確當之戰略與策略的意識形態差異，也促成了他們的分裂。這些國家的與革命的差異終於導致了一九六〇年末期一系列的邊界衝突^⑦。

近年來，中共對外政策的一般衝力也是基於國家利益的算計。這個新衝力背後的主要動機是「反制蘇聯的敵對行爲並克服中共

註⑥ Van Ness, *op. cit.*, 118.

註⑦ 見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中蘇衝突)* (New York: Atheneum, 1964); 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中國與東亞主要大國)*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32-80.

的落後。美國是唯一能嚇阻蘇聯攻擊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若要大規模攻擊中共，必須從歐洲抽調軍隊。因此，中共支持一個團結的與強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乃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中共曾敦促北約組織國家加強軍事力量，最近又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訂了長期貿易協定。它也表明了同一些北約組織國家作軍事聯繫的興趣。同時，中共鼓勵美國與日本對蘇聯的國際挑戰與擴張主義採取堅定立場。此外，中共於從事農業、工業、國防及科技現代化努力的同时，需要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合作與援助。因此，這也清楚地說明了，何以中共目前比較強調對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關係，而不注重昔日所強調的對開發中國家的關係^⑥。結果，意識形態與革命承諾已被沖淡，中共作爲一個革命強國的名譽，也已黯然失色。

中共聲言支援一切革命者，但其行動却有較大的抑制。一般說來，任何組織，其所攻擊的目標係中共所批准的，就可贏得中共的贊同，但是，除非該組織是當地共產黨或者已取得相當優勢，中共的支援絕不以該組織爲唯一對象。雖然中共所追求的最後目標是革命的新秩序，但是一般說來，它不會犧牲當前的國家利益，而去追求長程的革命利益。有時，即使是共黨所領導的反西方殖民政府的革命運動也得不到中共的支援。主要原因是，中共唯恐危及其與這些政府的國家關係。對非友好（即不予中共外交承認的）國家中的革命運動，中共可能給予公開的支持。對與中共保持外交關係國家中的革命運動，中共可能採取雙重戰略，即一面維持適宜的國與國關係，一面給予革命者以沈默的認可或物質支援^⑦。結果，國與國關係會受到損傷。誠如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所說：「我認爲，中共如果在東南亞終止顛覆活動，它將較受歡迎。這符合中共以及該地區各國的利益^⑧。」然而，中共從未放棄它的立場以及支援緬甸、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國內的「正義鬪爭」，儘管它與這些國家有外交關係。事實上，緬甸與中共很久以前就已建立外交關係，而中共對該國暴亂所給予的物質支援遠較在東南亞任何其他國家爲多^⑨。

貳

就追求國家利益與革命目標言，中共採取的是蘇聯共產黨早就實行的統一戰線戰略。

註⑥ Charners Johnson, "The New Thru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中國對外政策的新衝力) - *Foreign Affairs* (外交季刊), Fall 1978, 125-137.

註⑦ 彼得·范·納斯指出，一九六五年時，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大約一百二十個獨立與半獨立國家中，中共祇支持二十三個國家的革命武裝鬪爭。中共明確地不支持五個國家（法屬索馬利蘭、肯亞、克什米爾、緬甸及印尼）中的反政府武裝鬪爭，不承認其爲民族解放戰爭或反帝國主義鬪爭。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沒有一個稍具成就的反政府武裝鬪爭，沒有受到中共最低限度的沉默贊成。見 Van Ness, *op. cit.*, 82, 94-101; Robert C. North,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3rd. ed. (中國對外關係，第三版)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Press, 1978), 97.

註⑧ "Indonesia '73FOCU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遠東經濟評論) - December 24, 1973.

註⑨ Edwin W. Mart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End of Containment* (東南亞與中國：圍堵的結束)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26-42.

在國際事務中的統一戰線乃是中共獲取國內政治權力時所用之戰略的發展。中共用以贏取政治戰爭的戰略，其本質是「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強硬派」^②。統一戰線的理论基礎就是毛澤東的矛盾理論。在「論矛盾」中，毛澤東說：

「在複雜的事物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③。

易言之，在某一特定的情況下，一旦發現主要矛盾，政治領袖就可以選定主要敵人，確定其強點與弱點，爭取其他政治力量的協助以反對此一敵人，採取適當的戰略與策略予以擊敗。

職是之故，在國際事務中，中共必須隨時確定主要矛盾之所在。一旦主要矛盾被確定，就動員其他力量與之相抗。起初，在世界事務中，中共奉行兩個陣營的理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陣營。很自然地，中共倒向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陣營；其主要敵對力量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陣營，其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是，創造最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中共認為，「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極為尖銳；對美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與新近獨立及殖民國家之間的矛盾，也相當重視。爲了反對「美帝」，社會主義陣營構成了主要力量，新近獨立與殖民國家成爲主要同盟軍，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協助亦予以爭取。這樣一來，主要敵人遂陷於絕對孤立。

有時候，中共不指出主要矛盾，而指出若干基本矛盾。在一九六五年以前的若干年之中，中共所提出的四個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所謂被壓迫國家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的相互矛盾。但是，他們斷言，現世界的各種矛盾集中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上，「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大業」有賴於這些地區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成果^④。中共認爲非共產的工業化國家是「世界的城市」，而亞、非、拉丁美洲是「世界的農村」，「農村」終將以世界革命包圍「城市」。共產國家當然將提供支援^⑤。

當北平莫斯科翻臉成仇，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以及蘇聯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之時，反美統一戰線便變成了反霸統

註② 毛澤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三卷（北京：外語出版社，一九六七），一九四。

註③ 毛澤東，「論矛盾」，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一卷第二版（北京：外語出版社，一九六七），三三一——三三二。（譯註：一九六四年中文第十五版，第一卷，三〇八，三一〇。）

註④ 見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致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函，*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關於國際共產運動總路線的爭論）（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5），6-7, 13.

註⑤ 關於此一觀點的有系統的論述是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Long Live the Victory of People's War*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5)。

一戰線。中共將當前世界劃分為三個世界：蘇聯與美國是第一世界；已開發國家（西歐、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東歐共產國家）是第二世界；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共）是第三世界。第一世界剝削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含有雙重特性，它剝削第三世界，其人民也受第一世界國家的剝削。兩個「霸權主義」大國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蘇聯是世界大戰最危險的根源。第三世界的國家與人民構成了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與反霸權主義的主力。在反霸權主義的鬥爭中，可與第二世界結成同盟^⑭。

在一段短時間內，中共會把美國與蘇聯同列為仇敵與危險的國家。北平眼中的世界平衡基本上是個三角關係：（北平所領導並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真正革命陣營，美國所領導的「帝國主義」反動陣營，莫斯科所領導的「社會帝國主義」陣營。一九六九年之前，北平也許視美國所領導的「帝國主義」陣營為主要敵人，或至少與「社會帝國主義者」蘇聯「同列第一」。一九六九年以後，中共的敵人的排列順序發生了變化^⑮。美國被視為衰退中的強國，威脅較小；而蘇聯却是日漸上升的威脅。從此，中共的基本戰略是「既聯合又鬥爭」，尋求「暫時的同盟與間接的同盟」，與主要敵人蘇聯進行鬥爭^⑯。所以，我們見到，中共甚至全力歡迎美國參與反霸（即反俄）國際統一戰線，與第二及第三世界攜手合作，共同消滅蘇聯的戰爭計劃。

由於中共大力推行四個現代化並組織反霸統一戰線，美國以及第二世界國家的地位，在中共的眼中已經上升。北平亟需它們的支持以遏阻蘇聯的攻擊，也需要經濟援助以實行其現代化計劃。因此，在國際統一戰線中，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已發生變動。北平政權顯然比較重視發展其與美國及第二世界國家的關係，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已成次要。但是，中共並未放棄第三世界。他們理解，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及反帝國主義皆是他們爭取發展中國家支持的主要工具。

中共的聯合與鬥爭戰略由來已久。毛澤東很久以前就說過，「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重要部分是對資產階級「既聯合又鬥爭」^⑰……中共曾兩度聯合國民黨或國民政府對付軍閥及日本。在統一戰線期間，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爭取時間、避免滅亡並發展力量。他們從未放棄消滅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目標。

在中共頭目們的心目中，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中共「主席」華國鋒曾抨擊美國與蘇聯是當今最大的國際剝削者與壓迫者，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但是，他也贊同並引用列寧的格言，「利用敵人的任何裂痕」，「利用各種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和有條件的

註^⑭ 「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重大貢獻」，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係由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

第五次特別會議由首次加以解說。見北京週報（英文版）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六一—六十一。

註^⑮ Coral Bell,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World," (中國：共產黨人與世界) in F. S. Northedge, op. cit., 149-151.

註^⑯ 「團結人民，擊敗敵人」，北京週報（英文），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一—十三。

註^⑰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英文）（北平：外文出版社，一九六五），五九—一〇〇。

同盟者^②。」同以前一樣，現在中共聯合美國、日本及其他非共產工業化國家乃是抵制蘇聯攻擊、爭取時間的戰略。中共與非共產工業國家的前景截然不同，而且相互矛盾。無論如何，中共與蘇聯雖然相互衝突將近二十年，他們創造共產主義世界秩序的最後目標仍然相同。這一點使他們在進行猛烈的意識形態鬭爭、黨與黨相互成仇的同時，尚能維持「國」與「國」的關係。

統一戰線戰略的主要問題是，在一段時間內，專心對付一個主要敵人。此項戰略可以製造敵人。反之，盟邦與友邦不一定會成爲其主要敵人的敵人。中共堅持，凡欲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必須對北平當時的主要敵人表示充分的敵意。例如，在北平視美國爲主要敵人期間，北平堅持，別的國家，如日本與泰國，應避免與「美帝國主義」有同盟和親密關係。否則，他們就經常抨擊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傀儡。在五十年代中期，蘇聯開始尋求與美國和平共存及緩和緊張，中共猛烈地攻擊蘇聯的投降政策。蘇聯對美國的新路線是促成北平莫斯科分裂的因素之一。直到北平華盛頓實質關係改善之後，中共才停止激烈攻擊日本政府與美國的親密關係。

當蘇聯業已成爲中共統一戰線戰略的主要目標時，任何國家與蘇聯增進和解，中共輒斥之爲姑息，或含有把莫斯科注意力引向東方的邪惡動機。因此，中共批評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以及西方國家試圖減低與蘇聯間緊張情勢的其他努力。北平也把反霸條款強加於其與日本、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間的協定之中。當越南表現出進入蘇聯軌道的傾向時，北平與河內的關係立刻惡化。如果越南仍置身蘇聯軌道之外，中共可能不會發動一九七九年二、三月間的攻擊。目前，按照中共的理解傾向，任何挑戰皆出自莫斯科霸權主義的陰謀。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因此，統一戰線政策本質上是一個消極之道，往往試圖「在共同的敵意與共同恐懼的基礎上，而不是在一致的積極目標上，來聯合各式各樣的政治力量。本質上，統一戰線政策的根本原則是，找出那些與你的敵人不和的人，並試圖說服他們共同反對這個敵人。共同反對一個敵人是統一戰線存在的理由」^③。祇有當各國的共同仇敵存在時，這種消極的統戰方法才能繼續運用。

註② 華國鋒，「中共第十一次政治報告」，北京通報（英文），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四十一。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二十二日於北平舉行的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上，中共「副國防部長」粟裕談論到中共與蘇聯間的戰爭可能性。他的話頗有啓示性：「現在，我們雖然有原子彈，但是與我們的敵人相比，仍舊是『小巫見大巫』，或者是泥球比石頭。我們的泥球可以騷擾和羞辱俄國，但俄國用它的石頭可以給我致命的一擊。當然，泥球可以轉變成石頭，但是這需要相當時間。我認爲，我們與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的作用十分明顯。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石頭對抗俄國的石頭。這可用作西方國家所謂的『嚇阻』……一旦我們的泥球變成石頭，我們不僅對俄國無所畏懼，而且我們可以隨時給它一個教訓。」「粟裕提示與俄國作戰的可能性」，原載 *Inside China Mainland*（臺北，現代中國研究所），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譯註：引號內之文字係從英語逐譯過來，並非原始文句。）

註③ Van Ness, *op. cit.*, 63.

叁

按照前文分析，可以就持續與改變兩個觀點來評估中共的對外政策。

中國是東亞的一個主要大國與文明，自認就是天下，佔世界的中心。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四二）後，歷經挫敗。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還，中國知識分子與政府官員一直在尋求改善中國命運，恢復昔日地位與盛名。因此，可以確切地假定，由於中國的面積、人口及傳統，在中國大陸上的任何一個政府皆會積極關心國家利益，諸如，安全、統一、權力與聲譽、以及民族主義抱負，期望成爲一個公認的偉大強國。

但是，在其悠久歷史中，中國極少關心其疆土以外的世界。她是一個注重內部且以陸地爲主的國家。一般說來，祇有當她的安全受到威脅，她才作出軍事的與外交的反應。中國自信中華文明較之其他文明世界毫不遜色，故不甚求於外界世界，也無改造這個世界的興趣。按照孔子的思想，個人與國家必須自身行爲端正注重道德，才可作有效領導。孔子在「論語」中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中國人一向強調以身作則的政府，而不是以力服人。同樣的原則也用之於國際事務。孔子重「王道」而輕「霸道」。霸權必須藉武力與暴力獲得，因爲霸權係依靠人民的消極服從。在「王道」中，施德行仁並以德贏取人民的自動支持。傳統的統治者藉優越文化的力量與良好的治理以吸引鄰邦人民。武力爲拒抗「異族」的內侵所需，但是從未用作對外政策的主要工具。

中共黨徒採取了一百八十度相反的觀點。他們不相信國家間利益的調和。他們相信，祇要不同社會制度存在一天，矛盾與衝突就會繼續下去。他們不承認非共產政權的合法性，也不承認現今世界秩序的合法性。他們獻身世界革命。傳統的中國大抵以無事而自滿，而中共長久以來就斷言，「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傾向。實際上，中共鼓勵並以物質支助「革命」與「解放」運動。中共基於自己的經驗，認定要創造新的共產世界，武力至爲重要。

在過去，當中國面臨軍事攻擊或安全危險時，有時選用制衡戰略：以夷制夷。例如，漢朝時中國與西域各國結盟抵抗北方的匈奴。十九世紀末葉，中國與沙皇俄國訂立聯盟條約以抵制日本的威脅。雖然如此，在過去這僅是一個罕用的方法。

共黨政權却採取了一個更有系統的方法：統一戰線。與追求一個共同目標的聯盟不同，統一戰線是一個暫時的結構，在其成員之間存在一個複雜的矛盾模式。在統一戰線之內有矛盾，但是這些矛盾必須服從一個較大的目標：消除主要矛盾。國際矛盾隨着國際發展及北平對外政策需要而轉變，因此北平爲了對其主要敵人製造最大壓力必須組織不同的統一戰線。爲了獲取真實的戰略成就，中共企圖坐山觀虎（主要敵人與已成爲同盟的次要敵人）鬪。

當我們評估過去三十年中共對外政策的成就時，清楚地見到了其重大的進展，尤其在文化革命結束之後。它與一百二十多個

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包括所有主要的工業國家。它已進入聯合國，並在安全理事會內為常任理事國。其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訪問團活動於各大洲。中共雖然貧窮，但在國際經濟交流中却獲得貸款及其他優惠待遇。

另一方面，莫斯科仍是一個危險的敵人。蒙古、寮國、高棉及越南敵意頗深。阿富汗、印度及北韓皆不甚友好。大多數共產國家，包括古巴及阿爾巴尼亞，皆反對中共。中共繼續面對蘇聯的重大軍事與政治壓力，它與蘇聯及越南的軍事衝突破滅了和平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幻想。

開發國家中的叛亂分子雖可以而且正被利用，壓迫當地政府採取有利於中共的政策，但北平正處於進退維谷的窘境，它必須生活在現存的國際體系之內，但仍須顧慮其世界革命目標。北平宣稱，革命不能輸出，但是經常給予「民族解放」運動以政治支持與物質援助。中共表現出一種傾向，把其革命經驗傳播海外。這種革命傾向在國際政治中確會製造騷動，也為中共自己招致困難。每逢北平強調意識形態考慮重於實際利益時，中共對外關係就遭受挫折。

北平最初把華盛頓視為主要敵人；然後莫斯科與華盛頓「平分秋色」；最近七年中，蘇聯取代美國的地位成了頭號敵人。中共領導宣稱，他們已繼承了革命外交路線——「三反路線」，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反一切國家的反動派。中共是否時時刻刻需要「不可調和」的外敵？一個對其他國家深懷敵意的政權能否在世界事務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在多大的程度上，這種敵意係因國外發展所致而與北平的內外政策無關？按照中國歷史，中共政權的對外政策在那些方面極端地偏離了中國的過去？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注意。